

近几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评述

那朝英/文

[摘要]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以高校为依托,建立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实力有了显著提升。在本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和中澳关系变迁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议题领域广泛,热点突出,尤其关注了和澳大利亚紧密相关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模式等问题,形成了虽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偏重政策研究、华人研究者居多等特点。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着研究内容分散、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局限。

[关键词] 澳大利亚 中澳关系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与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打交道,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各国都强化了对中国的全方位研究。随着中澳关系的日益深化,澳大利亚政府及学界也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客观认识,影响着该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对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介,不仅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了解整个澳大利亚的涉华思想动态,更有助于中澳外交实践的稳步推进。

相较于欧美,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早期的研究者很多都有欧美背景或教育经历,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受欧美中国研究的影响,经历了从沿袭、模仿到逐步规范、本土化,进而独具特色的过程。基于了解中国的迫切需求,澳大利亚政府在中国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最重要的政府性学术研究资助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的“探索发现类”研究项目资助了众多和中国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大高校成为中国研究的主要阵地。从机构设置、教职安排、出版刊物和学术活动来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以这些高校为依托先后成立各类中国研究中心或亚洲研究中心渐具影响力,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一些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非常具有影响力。

整体而言,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在机构设置、刊物建设、研究人员数量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和实力,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成果丰富。同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表现出了有别于欧美的独特研究视角和议题偏好。

一、研究热点

纵观近些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其研究领域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拓宽,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国防、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但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随着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遭遇困难,中澳双边关系,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对中澳关系的重要影响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

(一) 中国的对外关系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1. 中澳关系

中澳关系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意味着中澳双边关系已成为澳大利亚学界和政界关注的主要焦点。^①近几年,在中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中澳关系也出现波动。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呼吁澳企业实现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华贸易的依赖。对此,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澳大利亚研究所(The Australia Institute)、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澳中关系研究院(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等各智库及高校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开展了研究和讨论,对中澳关系的现实做出了一些理性思考和判断。

自中澳建交以来,澳大利亚对华采取的主要战略是“接触”与“平衡”。在这一战略基调下,总体而言,两国的贸易往来较为平稳,中澳关系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但近年来,澳大利亚将美澳同盟关系视作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和基石,在中美经贸摩擦和科技脱钩的背景下,中澳两国关系摩擦增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威胁”的讨论也再次喧嚣起来,澳政府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意识明显增强,其军事战略部署针对中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据有的观察,澳对华政策似乎已经转变为“防范”与“制衡”。^②针对中澳关系出现的这一转变,澳大利亚学术界和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了贸易惩罚,主张推动澳大利亚出口贸易的“多元化”,进而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③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也从贸易角度理性分析了中澳关系,认为中澳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双方的摩擦是可控的。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双方的摩擦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但贸易是双向的,各方采取的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惩罚性措施,虽然会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也会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双方会适可而止。^④另外,中澳双边贸易的结构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中国

^① Mark Beeson and Jinghan Zeng, “Chinese Views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Not a Flattering Pic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 Feb., 2016.

^② 宁团辉:《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

^③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 Theory vs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china%E2%80%99s-economic-coercion-%E2%80%94-theory-vs-practice>.

^④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There’s No Need for Panic over China’s Trade Threats”,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there%E2%80%99s-no-need-panic-over-china%E2%80%99s-trade-threats>.

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虽采取了较大力度的惩罚,但真正受影响的只占澳对华出口的4%。除此之外,中澳贸易里最关键的铁矿石贸易对中国有较大制约,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中有60%来自澳大利亚,所以中澳双方都避免了涉及铁矿石这项内容。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中国未来10年的购买力预计将超过美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企业要制定战略来管控风险,不能仅寄希望于转移销售市场,而是要立足于稳定中澳关系。因此,中澳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不太可能再进一步升级。^①

在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强化了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但与此同时,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未发生实质性退步。这导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也引起澳大利亚自身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使其在对华关系上产生了不适应感^②,造成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不清晰。因此,部分澳大利亚智库的研究报告在分析中澳摩擦时,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澳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图不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直接和间接代价计算不清^③,需要调整。例如,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了一篇题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方式需要重大改造》的报告,直截了当地提出澳大利亚政府现在缺乏好的外交政策,只是提出一些“口号”。^④另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不应该和中国正面冲突,而需要更准确地解读当前的局势,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立场,并积极地看待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价值,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去妖魔化和去政治化。^⑤因为中澳经济的互补性仍然存在,而且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及中产阶级的增长速度而言,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与中国匹敌。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还是创新的关键供应商和合作者,与中国接触本身就有助于市场多元化。^⑥因此,澳大利亚要深刻讨论

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机遇和挑战,避免两极化观点,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平衡和务实的对华外交政策,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更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应该回归实施了50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这一政策对澳大利亚非常有利,可以降低卷入任何中美或东亚冲突的风险,并增强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大国的选择余地。^⑦

2. 中美关系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取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另一方面也深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又依赖中国的广阔市场,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时期,其推行的平衡外交策略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当下,平衡战略面临挑战,选边站的压力凸显。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为澳大利亚外交战略调整带来困境,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成为困扰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的核心问题。因此,中美关系也成为澳大利亚学术界和政策界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议题。

①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Why Australia is on Its Own in Its Trade Conflict with China”,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why-australia-its-own-its-trade-conflict-china>.

② 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③ The Lowy Institute, “On China, Australia is Left Counting the Cost”,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a-australia-left-counting-cost>.

④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Australia’s Diplomatic Approach Needs a Major Revamp”, <https://www.tai.org.au/content/australias-diplomatic-approach-needs-major-revamp>.

⑤ Kerry Brown & Hannah Bretherton, “Australi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SA: the Challenge of Grand Strateg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Jan., 2016.

⑥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Behind Headlines, Why Australian Companies are Still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behind-headlines-why-australian-companies-are-still-doing-business-china-0>.

⑦ Garry Woodard,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Navigating between Big Fish”,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 Dec., 2017.

对于中美关系及其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也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看法。有学者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深入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的网络中,同美国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近期受到了脱钩政策的威胁。自2018年以来,美国方面对于国家安全的强调取代了经济发展逻辑,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呈现出了“技术战”的特征。由于两国都在追求更大的技术自主性政策,双赢的领域和空间正在不断缩小。^①也有学者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认为中美分歧给不愿选边站的企业和第三方国家带来了挑战,并干扰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促进增长和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②,这使得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模糊。^③在罗伊研究所2019年进行的民调中,有69%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美同盟关系使得澳大利亚更有可能被卷入亚洲地区发生的、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冲突。^④还有学者积极探讨了恢复中美健康关系的途径和措施,认为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更广泛利益取决于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政策和态度,而只有中国领导人才有能力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中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去加强那些希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和富有成效的人的力量。^⑤

作为在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在这一区域的博弈正在不断复杂化。对此,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主导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既有经济和商业原因,也有战略考量,是中国为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欧亚大陆开辟区域安全空间所选择的软平衡政策。美国虽然仍然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强国,但在地区经济治理方面已陷入相对衰退。^⑥事实上,在美国不断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如果跳出中澳两国关系,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把美、日、澳、

印都考虑进来的话,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澳大利亚学界和决策者也非常注重通过美、日、澳、印“四国机制”来应对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曾发布了题为《“四国机制”能起飞吗?》的研究报告,认为2020年“四国机制”的所有进展都和澳大利亚相关,尤其是美、日、澳、印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演习标志着“四国机制”进入了新阶段。^⑦澳大利亚正好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处,也是美、日、印在地理上的中间联结点,通过印澳安全合作、日澳防务协定、日澳印供应链合作,澳大利亚事实上成为了“四国机制”实体化的关键结合部,在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印太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对自身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和地缘政治考虑,以及具体的经济、安全和资源利益诉求,将保持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视作本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历届澳政府都积极寻求主导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尤其注重对该地区的秩序维护,长期以来,一直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自2014年以

^① David Capie, Natasha Hamilton Hart and Jason Young, “The Economics – Security Nexus in the US – China Trade Conflict Decoupling Dilemmas”, *Policy Quarterly*, Vol. 16, No. 4, 2020, pp. 27 – 35.

^② Ibid.

^③ David Schaefer, “Australia’s New Alliance Dynamics, US – China Rivalry and Conflict Entrapment in Outer Spa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 Aug., 2017.

^④ Natasha Kassam, *Lowy Institute Poll 2019*, p. 27.

^⑤ Peter Harri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for Smart Appeas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 Jan., 2021.

^⑥ Lai – Ha Chan,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S ‘Pivot to Asia’: China’s Geostrategic Rationale for Establish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 Aug., 2017.

^⑦ AIIA, “Will the Quad Alliance Take Off?”,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will-the-quad-alliance-take-off/>.

来,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加快了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的步伐。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这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澳大利亚人甚至产生了不安和焦虑,担心澳大利亚由此失去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掌控权。因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了以加强地区安全与经济整合、深化盟友协作、防范中太合作等为重点举措的“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战略。^①

过去几年,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多次炒作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给中澳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强调澳政府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澳学者詹姆斯·巴特利(James Batley)就指出,“太平洋升级”战略并非全面排他,而是特别针对中国。^②事实上,近几年,中国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投资、贸易和援助都有所上升,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被澳大利亚部分媒体夸大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援助远低于澳大利亚。相反,澳大利亚本身并不希望太平洋岛国真正实现经济独立^③,其“太平洋升级”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绑定”太平洋岛国经济^④,将其作为自身的战略缓冲区。

相较而言,澳大利亚大部分学者和智库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各岛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及判断总体上较为理性和客观。在西方有些国家炒作“债务陷阱外交”的背景下,2019年,罗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有关太平洋岛国“债务陷阱”的分析报告,肯定了中国的援助在促进太平洋岛国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认为“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中国没有在太平洋地区有意进行‘债务陷阱’外交”。^⑤乔安妮·沃利斯(Joanne Wallis)也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是专门设计的结果,而是存在偶然因素。^⑥彼得·康诺利(Peter Conolly)认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利益相对有限,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和投资在

其对外贸易和投资总额中占比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增长有可能导致意外摩擦,但相关方可以以管理或防止误解的方式行事,通过加强合作来降低这种风险。^⑦

(二)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影响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稳步推进以后,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关注和研究。2013年至2017年间,澳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开始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期望寻求有限合作。2017年底,在美国对华战略不断转向的大背景下,澳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其发布《反对外国干涉法》,改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中澳经贸合作遭遇重挫。然而,澳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和讨论却突破了政策转向的束缚,展现出比较求实和

- ①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https://www.dfat.gov.au/publications/minisite/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fpwhitepaper/foreign-policy-white-paper.html>; Scott Morrison, “Address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A New Chapter’”, <https://www.Pm.Gov.au/media/address-australia-and-pacific-new-chapter>.
- ② James Batley, “Review: Safeguarding Australia’s Interests through Closer Pacific Ties”, <http://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review-safeguarding-australia-security-interests-through-closer-pacific-ties>.
- ③ Wesley Morgan, “Oceanic Hydro - Politics: Exploring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of the Blue Pacific”, https://www.Griffith.edu.au/_data/assets/pdf_file/0015/1002309/RO64-Morgan-web.pdf.
- ④ Greg Colton, “Stronger Together: Safeguarding Australia’s Security Interests through Closer Pacific Ties”,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stronger-together-safeguarding-australia-security-interests-through-closer-pacific-0>.
- ⑤ Roland Rajah, Alexandre Dayant and Jonathan Pryke, “Ocean of Debt? Belt and Road and Debt Diplomacy in the Pacific”,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9, p. 1, pp. 7 - 14.
- ⑥ Joanne Wallis, *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 Carlton: MUP Academic, 2017, p. 262.
- ⑦ Peter J. Connolly, “Engagi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9 Jun., 2016.

理性的一面。

1.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等问题的理论探讨

尽管部分媒体和研究者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澳大利亚及印太地区产生的影响表示了担忧和警惕,但是更多学者则较为客观地从各个角度对这一倡议进行了深入解读。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内外背景及中国的战略意图,认为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也有学者将这一倡议视作中国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全面评估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和趋势。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问题时,学者们尤其关注中国在沿线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认为中国既有国家能力,也有实践经验,可以使这样一个项目成为现实。^① 更多研究集中于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影响,认为在当前这种国际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成功,不仅将真正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强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② “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雄心令人惊讶,中国有速度惊人的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如果中国为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提供基础设施的承诺得到履行,将大大提高相关地区的整体生产力。不仅中国的邻国将从这些发展中受益更多,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还可能积极促进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连接。^③

2. 关于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辩论

面对持续稳步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澳大利亚国内展开了一场是否对接和加入其中的政策辩论。总体而言,根据其态度和倾向,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以鲍勃·卡尔(Bob Carr)、休·怀特(Hugh White)、琳达·雅各布

森(Linda Jakobson)、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和彼得·德里斯代尔(Peter Drysdale)等人代表的一派,持较为温和与务实的态度。他们主张澳大利亚要实事求是,正视中国快速发展和不断崛起的现实,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间继续保持战略平衡,积极推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搭上“一带一路”发展的快车,重视“一带一路”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益处。^④ 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区域性合作机制,是中国对全球化的重要贡献,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态度以及古代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平等互利合作的精神^⑤,有利于沿线相关国家形成包容性发展的共识,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降低合作成本,共同获益。“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版的全球参与计划,积极参与其中,必将为澳大利亚带来更多的中国投资,有利于澳大利亚平衡对美国的安全依赖。^⑥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拒绝冷战思维,与中国建立信任关系。^⑦ 同时,澳大利亚要在防止过于依赖中国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外贸多元化。^⑧ “一带一路”倡议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与邻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和经贸合作双赢

① Mark Beeson, “G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3 Sep., 2018.

② Ibid.

③ Mark Beeson, “China’s Big Idea: Making Sens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3 Sep., 2018.

④ 盛楚宜:《澳专家盼澳大利亚搭乘“一带一路”快车》,人民网, <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17/0426/c1002-29238114.html>.

⑤ Hugh White, “Dawn of the Post – American Order in Asia”, *The Straits Times*, 30 Dec., 2017.

⑥ Ibid.

⑦ Peter Drysdale, “Australia Must Move beyond Cold War Thinking”,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2/05/australia-must-move-beyond-cold-war-thinking/>.

⑧ Stephen FitzGerald, “Managing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inese World”,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tephen-fitzgerald-managing-australian-foreign-policy-in-a-chinese-world-74607>.

的重要途径。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和机构对华态度比较强硬,强调澳大利亚需选择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①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实质性地提升中国的软硬实力,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②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导致澳大利亚进一步依赖中国市场,从而给澳带来严重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为了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应该避免接触“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应以“太平洋升级战略”“印太战略”和“四国机制”等进行替代性对抗。这些观点的不断泛化和广泛传播也是近几年中澳经贸合作遭遇重挫,两国关系动荡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中国数字经济新模式

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各级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贸易作为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也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已于2019年实施。同时,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正在快速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初级形态,如今已成为国际贸易进一步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可以预见,数字贸易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然而,有关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还非常不完善,且远远滞后于实践,各国开展数字贸易面临诸多壁垒和障碍。因此,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规律和新规则、信息技术资源的国际竞争方式以及相关国家政府及其企业相互借力共同进退的战略最近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进入数字时代后,澳大利亚政府也非常重视产业领域和医疗卫生、城市、教育、社区等民生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正在积极推动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他们尤其重视数字经济在驱动澳大利亚综合国力提升进程中

的关键作用,力图通过数字经济的领先发展驱动澳大利亚成为网络智慧国家。这引发了其学者和媒体对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发展经验的研究兴趣。中国作为网络发展的新兴大国,用户基数大,市场活跃,表现出巨大的后发优势,甚至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电子商务等领域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涌现出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因此,澳大利亚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这些新经济发展模式表现出了巨大的探究兴趣,对数字货币、社交平台、电商平台、智慧城市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澳大利亚企业界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下,中国市场的变化速度加快,现在比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更具竞争力。中国消费者及电子商务平台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先进的,澳大利亚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经验可以快速地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从而提高成功的几率,将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有效地转化成盈利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优势。^③通过对比研究,有澳大利亚学者及媒体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方面,他们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电子商务出现时间要早于中国,但目前的发展态势却落后于中国,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采取了鼓励创新的做法。此外,在持续的创新和研发投入支持下,中国互联网、数字货

^① Graeme Dobell,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China Challenge”, ASPI – The Strategist, <https://www.aspi.org.au/the-evolution-of-australias-china-challenge/>.

^② Mark Beeson, “G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3 Sep., 2018.

^③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Behind Headlines, Why Australian Companies are still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behind-headlines-why-australian-companies-are-still-doing-business-china-0>.

币和数字支付等新经济要素蓬勃发展:中国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方面领先世界,创设了世界上首个主要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①;中国已经开始从现金向数字货币支付转变^②,移动支付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其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次数是美国的11倍。所以,相较而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经济体。^③

二、研究特点和趋势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在近几年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就整体而言,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地理位置和现实国情,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

(一) 研究议题较为多元,但偏重政策和实务

近几年,得益于中国学术交流的不断开放和活跃,澳大利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可以深入中国开展交流研究活动: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从事访问研究、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参加会议、利用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等。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外交、军事等议题都有学者进行研究。随着中澳关系的调整 and 变化,主要研究机构的发展与研究方向的演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首先,受当前热点事件和全球发展趋势的影响,各学科中的一些新兴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历史学中,对中国环境史和性别史的研究比较多;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关注视角和重点不再过分聚焦于核心政治人物和政治结构,正在从宏观战略层面转移到具体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重视中层理论的研究和检验,研究内容不均衡^④，“一带一路”倡议、南海问题、中美经贸摩擦、环境治理、区域秩序等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但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缺乏。其次,跨学科研究的趋向明显。跨学科

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也表现出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向。各中国研究中心的建设也非常重视跨学科视角,成立了各种综合性研究小组,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共同研究。最后,研究导向偏重政策与务实,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氛围不浓厚,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学术研究主要靠政府资助和协调,决定了这一部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制定内外政策、解决国内社会与经济问题服务。另一方面,基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不对称性依赖,重视中澳经贸和文化交流研究的实用型现实研究风气本身也是澳大利亚学术界开展中国研究的一贯传统。

(二)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但华人学者占比比较高

澳大利亚政府和学界对于印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变化高度敏感。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现代化、亚投行的设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澳大利亚开始将中国视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行业专家都开始参与到对中国的研究当中,壮大了中国研究的人员队伍,丰富了研究视角。老一代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中,有不少是西方人,或者有欧美留

① East Asia Forum, “The Future of Digital Currencies will be Determined in Asia”,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4/05/the-future-of-digital-currencies-will-be-determined-in-asia>.

② Sydney Morning Herald, “What does China’s Shift to Digital Mean for Australia?”, <http://www.smh.com.au/business/the-economy/china-s-new-dig%E2%80%A6>.

③ 杜永光编译:《澳媒:中国将赢得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竞赛》,中国日报网, https://world.chinadaily.com.cn/wykgz/2018-07/12/content_36564523.htm.

④ 吴志成、韩笑:《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

学背景和从教经历,他们中有许多人参与组建了各种中国研究学术机构,并担任负责人。然而,随着大量中国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及学者开始活跃于澳大利亚学术机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术团体的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优秀研究成果也多由华人学者参与完成。可以说,来自中国的学者对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在华人学者的影响下迅速发展。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受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限制,大量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的研究视角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其研究成果在澳大利亚国内的认可度也容易受到削弱甚至质疑。

(三)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国际影响力有限

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尽管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是近年来研究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涵盖了众多学科。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中等强国,其全球影响力有限,加之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学术交流和人才流动,这导致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关注度有限,同中国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欧美主流期刊的情况也比较少。此外,澳大利亚专门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刊物多为半年刊或季刊,发行周期长,版面较少且讨论议题很分散,大多只有电子版,也缺乏专职编辑团队,限制了中国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和国际传播影响力。

(四) 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

澳大利亚早期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为文史哲专业出身,因而,传统的规范和定性研究方法在当时占据主流,目前这一格局仍没有发生大的改变。面对中国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改革和对外交往问题,学者们仍然依赖于从历史、文化、哲学等角度诠释它们。虽

然有部分学者将定量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依然是澳大利亚大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所选择的重要路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经过多年发展,以高校为依托,建立起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专业期刊和著作等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实力有了显著提升。随着新一代学者逐步成长并活跃于学术界,研究议题有了进一步拓展,中国发展的新兴领域广受关注,特别是能够影响其国内政策制定的中澳经贸往来等实用性强的问题,形成了应用性强、关注中国新发展模式等独有特点。但是,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着研究内容分散、研究方法滞后、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小等诸多短板。尤其是,近几年受到中澳关系的不利影响,学术观点两极对立现象较为明显。■

[那朝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超)